

人文译丛 北京博雅出版社

East Asia Theory: Criticism
on Japanese Modern Thoughts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日】宇野浩二著

赵京华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East Asia Theory: Criticism on Japanese Modern Thoughts

东亚论——日本现代 思想批判

[日] 子安宣邦 ◆ 著

赵京华 ◆ 编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54-6

I. ①东…

II. ①子… ②赵…

III. ①思想史—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B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81 号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著 者:(日)子安宣邦

编 译:赵京华

责任编辑:崔文辉 隋 军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8.5 字数:256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54-6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文版作者序言

从我们自身的体验中去追寻，何谓 20 世纪的“近代”、何谓“亚洲”乃至“日本”？这是我作为思想史学者的使命。这种想法的产生是从世纪转换即将来临的时候开始的。出生于 1933 年（用日本的年号来讲就是昭和八年）的我，其生活的大半是在 20 世纪的昭和这一时代之中度过的。1942 年，当时还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我，有一天听到年级任课的女教师说“日本长期以来在战争”。我一直认为在前一年的 1941 年 12 月所发动的与英美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呀，老师所讲的“日本长期以来在战争”，还是头一次听说呢。后来，得以理解这“长期战争”的意义，是在终于迎来了 1945 年战争终结之后。就是说，对于 1942 年当时日本的孩子们，不，勿宁说对大人们来讲，“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并非战争，战争意味着的不是与亚洲的战争，而是与英美的战争。

然而我懂得，在这个孩提时代的小插曲里，蕴涵着一些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 1930 年代以后到战败，或者直至今天的日本，其对亚洲、对中国的关系问题有关。那时，日本强使朝鲜半岛屈服，在满洲建立伪傀儡国家，向中国大陆推进其军事力量；可是，在孩子们的意识中，有的只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日本帝国那光辉的自我形象。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所要追求的也就是这个自我形象。而目前所面临的世纪转换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规定了 20 世纪我们日本人的知性和意识的、对我们来说是历史性先验存在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去追问这个世纪中的我们自身。一生的大半处于 20 世纪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确具备

反思这个世纪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特权。可是，这个源自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性体验的特权和优势，也同时负载着沉重的伦理性。20 世纪于世界中无辜至死和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每想到这个 20 世纪，背负着不能在传给下一代的这份负面遗产的我们这代人的特权和优势，实在不是可以高声夸示的过来人之特权和优势。与无意义而死去的那些死者一道，去质疑覆盖在他们身上的被赋予的虚伪意义和价值，剥下其假面，我们的特权和优势就是这样一种背负着伦理性债务的沉重的任务。

成为近代日本人的意识之先验存在的，乃是近代国家所共有的一国中心主义意识。日本的一国中心主义与脱亚入欧的历史意识同时形成。而日本一国的近代意义上的确立，也就是对亚洲的压抑，对亚洲的遗弃。可是，对于东亚和日本来说，中国乃是一个先在的国家，一个远比自己久远的文明。因此，中国对于东亚和日本来说，正是一个先在的、历史性先验存在。没有中国，也就不会有日本的存在。然而，近代日本是如何将大国中国从自己的意识构图中抹消掉的，日本是怎样确立起自己的一国中心主义的呢？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人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消掉的历史实验过程。身处世纪的转折点，我所要做的就是重新追问构成日本和日本人的这个历史先验认识，而且是在与试图抹消和遗弃的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中来追问这个“日本”。

我始于所谓日本战后 50 年即 1995 年前后的上述重新追问日本近代的论述，最早是以《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和知识分子》（岩波书店，1996）结集出版的。进而，在迈入新世纪之后，我又出版了《“亚洲”是怎样被叙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藤原书店，2003）和《汉字论——不可避的他者》（岩波书店，2003）。并在最近对《近代知识考古学》一书做了修订增补，以《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国知识的成立》的书名，列入岩波现代文库书系中而于去年问世。我当初就有一个愿望：这些著作中我的批判性工作的成果能同时为中国的读者和日本读者所共有。我的这个愿望，因了中国友人的努力，马上就要付诸

实现了。从历史学、政治学到民俗学和国语学等等，我的工作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实在是多方面的。而对于将这些译成中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项困难繁复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京华博士，我惟有深深的敬佩。拙著得以在中国与新的读者见面，我含着这份喜悦从心里感谢赵博士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子安宣邦

2004年3月10日

目 录

中文版作者序言	001
---------------	-----

上 编

一、“世界史”与亚洲、日本	003
二、黑格尔“东洋”概念的紧箍咒	021
三、昭和日本与“东亚”概念	039
四、关于东洋性社会的认识	056
五、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国像	068
六、“东亚”概念与儒学	078
七、“日本一国文明史”的梦想——关于《国民的历史》	094

下 编

八、一国民俗学的成立	117
九、近代知识与中国观——“支那学”的成立	146
十、置“国语”于死地，“日本语”就诞生了吗？	175
十一、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 ——战争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	194
十二、在“隐蔽”和“告发”之间	

——战争记忆与战后意识	224
十三、何为“汉语”	240
子安宣邦的日本现代知识考古学——代译后记	261

一、“世界史”与亚洲、日本

各国家民族以各自个性化历史生命为生存根基，同时，秉承各自不同的世界史使命而结合为一个普世的世界。……这必然是由此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

——西田几多郎《世界新秩序的原理》^[1]

如果说我们对英美有值得感谢的地方，那么这就在于他们把我们拖进了这个“世界”中，而且，与原来各自的意图相反，使我们不得不回归到东洋自身的立场上来。这里存在着世界理性的狡狴。

——高坂正显《民族的哲学》

我国于东亚曾经建设起国家来，更于欧洲性的世界获得新的发展。并且，如今又于新的世界史性的世界中不断推进其建设。

——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学》

亚洲视角和江户视角

在这次以“1850—2000年世界史中的日本”为题的研讨会^[2]上，之

所以给予我发言的机会，想来是因为我近年来确立起“作为方法的江户”视角，并由此展开了对日本近代史及近代知识的批判性论述。所谓“作为方法的江户”，不用说，是依从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而构成的、旨在历史批判的方法论视角^[3]。正如“作为方法的亚洲”意味着从亚洲出发，对归结为欧洲近代之胜利的世界史做批判性反观的视角一样，“作为方法的江户”亦是从小江户出发，对日本近代史和近代知识构成做批判性反思的视角。更直白地说，“作为方法的江户”乃是从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外部之江户来观察近代日本。发源自江户的批判性视线自然要与以往构成江户像的近代视线发生严重的撞击。正如“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发源自亚洲的视线要与以往构成亚洲像之近代欧洲视线，即东方主义发生严重撞击一样。当观察“1850—2000年”的日本时，把“作为方法的江户”和“作为方法的亚洲”重叠起来，对我来说将构成有效的批判性视角的。

发源自江户的视线亦是差异化的视线。发源自近代的视线追溯与自身有着谱系学的连续性，试图构筑起可谓自我塑造的自身形象。而发源自江户的视线则要描画出与江户相异的近代日本的发端，展示其作为新事物的非连续性的相位。关于本居宣长我做了很多论述^[4]，其关注的重心在于阐明“我们日本人”“我们的日语”等关于日本自我同一化的主张是怎样作为特殊的话语出现于18世纪的德川社会的。这些成为近代日本正统性话语的本国文化上之同一性和言说同一性的主张，在德川后期社会中只是一种完全依据不可靠的前提，由极少数论客的“信”所支撑起来的独善性乃至偏颇性的话语^[5]。而“作为方法的江户”将阐明近代知识及其坚信不移的不可靠的形成过程。我所说的“近代知识考古学”便是凿穿日本近代知识话语成立基础的探索方法^[6]。也是将亚洲视线重叠于江户视线而构成的思想史探索方法。

这里，我依然试图用将亚洲视线重叠于江户视线的方法来观察日本近代的造始。对日本来说近代是怎么开始的？伴随着近代的发生，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日本其自我表象、历史表象是怎样重新创造出来的？又是

怎样变化的呢？

1850 年这一时段

“1850—2000 年”这一题目中的 1850 年并非单纯取自表示 150 年时间经过的综合数字的一个年份。1840 年的鸦片战争、1853 年的佩利渡航日本、1859 年的日本开放口岸、1860 年的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及 1863 年的萨英战争（因“生麦事件”导致的日本萨摩藩与英国东洋舰队之间的战争——译者）等等，只要举出上述年表中的事实，就会清楚 1850 年在东亚所具有的意义。1850 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人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也是我在此论述的主题“世界史的哲学”之论客高坂正显讲道：“近代性世界通过英国而在世界范围得到扩大。于是这‘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至少‘世界’开始走向同一个方向”^[7]。如果说，随着这一整体的“世界”之完成，“世界史”之历史性世界也得以成立的话，那么，1850 年便象征着东亚和日本被组合到这一“世界史”中来的时期。附带说明，所谓非西欧地域的世界史乃是打上了引号的“世界史”。而亚洲的世界史又是自身被组合进来的“世界史”。高坂在前面说道，我们是被“拖进”“世界”中来的。我在此，将与这个非西欧地域被编入到“世界秩序”而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作为“世界史”打上引号来使用。

我关注 1850 年，是因为它与 1868 年这一日本政治史上的时期划分具有不同的意义。1850 年并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分期，而是意味着东亚“世界史”成立的时期划分。因此，与“1850—2000 年”这 150 年的时期划分一起被追问的，是背负着东亚这一地缘政治学上的区域划分的日本，如何被组合到“世界史”中，而不久又是怎样自己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世界史”中来的？如果从我的思想史专业角度来谈这个课题，即所追问的是近代日本的“世界史”思想体验之话语上的趋势，也是近代日本关

于“世界史”之自我表象的状态。从与这个“世界史”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将 1850 年至 2000 年的日本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第一个时期当然是始于 1850 年。东亚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通过对“世界史”的历史性体验，日本把自己构筑成近代国家。与“世界史”相关的第二个时期，我认为始于 1930 年。这是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史”、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日本，面向世界要求重构“世界史”、重组“世界秩序”的时期。日本是“世界史”的积极参与者、“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这一时期，我认为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代。因为，从“世界秩序”重要成员的位置来看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即 1930 年代由帝国日本所形成的认识图式，并没有因为 1945 年日本的战败而获得本质上的改变。从战败到 1950 年代的战后日本，难道不是应变化而未曾去改变的日本吗？从 1930 年到 1980 年的时期，大致相当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暂短的 20 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8]的时期。而第三个转折期即 1980 年代，则不单单是日本，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恐怕意味着“世界史”的终结和新的历史^[9]之开始的吧。

组合到“世界史”中去

与东亚一起，日本的近代是以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被编入“世界史”过程而开始的。日本的近代化意味着自愿走向发源于欧洲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日本，或者亚洲的近代，也就意味着这种有着清晰发端的历史过程。如前所述，“作为方法的江户”视角就是要注视将自己与江户差异化的近代日本的发端，观察其非连续性的发生发展。而“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视角，则是从编入欧洲化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的过程来观察日本近代的发端。这样来观察近代的历史性发端，也便是预想其历史性的终结。我认同于这样的提法：即沃勒斯坦所谓作为“历史性秩序”的资本主义^[10]，就是说作为有开始便有终结

的历史性构成的资本主义，其社会的、经济的秩序这一提法。我们要了解其何以发生，是因为要知道其终结。正如朱子依据《易》之“原始反终”寻求生之原始而知其死之终了一样，人们观察事物是怎样开始的，可以知道事物是如何终结的。

自愿走向“世界史”也便是将自己编入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历史当中。将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历史性的表象化，即是作为这一普遍主义的“文明”之有资格的接受者，或者作为这一“文明史”在亚洲所诞生的嫡系弟子而把自己做历史性的表象化。沃勒斯坦说“普遍主义是强者送给弱者的‘礼物’”^[11]。这个“礼物”对正直的接受者是使之接受其屈从，对反抗者来说是使之承担其失败者之不利的双料“礼物”。近代日本是一个以和魂洋才式的策略巧妙接取这一“文明”的强者之赠与的接受者。明治日本将自己的历史同化于这一普遍主义的“文明史”，建立起文明史之自我的历史表征。竹越与三郎的《二千五百年史》^[12]就是将“新日本”作为这个“文明史”的嫡系弟子，通过日本的历史表象来显示的文明史式历史叙事。

在这个日本的文明史式叙事中，有一个竹越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即怎样从文明史的角度来阐释由中华帝国到日本帝国之近代史上东亚盟主更换的必然性。在此，竹越采用了针对象形文字而强调与之对抗的声音文字的文化表征。他认为，具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汉字这一象形文字所代表的大陆文明，虽然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日本却建立了独自の国民文化，并得以发扬光大，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发明了假名文字，将声音文字作为日用文字来共享。竹越是把这种假名文字的形成作为“背负声音文字之文明的人种之胜利”来叙述的。

代表支那文明的象形文字其势力极其强大，然朝廷虽对此尊崇备至，民间却并不因此而使用象形文字。……虽然象形文字其势力对微弱之日本文明的压力如岩石压卵一般，却不曾压倒，创造出平假名、真假名者，难道不是其满足了国民之需求的证明

吗？虽然从一开始也多少使用了一些文字。……象形文字不曾变成国民的语言文字，却有别一种声音文字遍及全国，观此可以认为日本有其固有的声音文字，同时此乃背负其声音文字之文明的人种之最终胜利。

日本被结合到声音文字之文明的胜利这一当今的“世界史”中来。竹越在此阐释的是，腓尼基·印度文明这一古代声音文字文明的潮流早就洗礼了古代日本列岛，其文明的语言上的产物留在了这个列岛上。

竹越的《二千五百年史》是从文明史方面讲述帝国日本重新登场的正统性之叙事。这个正统性大概会因奋发的国民和国民文化的形成而得到证实吧。我们不必去看竹越共鸣于（丰臣）秀吉伟大抱负而对朝鲜战役的详细描述，不必看他对德川日本有组织的社会压抑及在“谋求安康之幕府”下日本的贫弱不振的慨叹，也会知道竹越的叙事乃是已然作为东亚盟主而君临于世的“帝国日本的国民史”。他的《二千五百年史》已具备了1850年至1930年的日本，其自愿编入“世界史”这一近代文明史之历史表象的特征^[13]。

昭和日本与对“世界史”之再认识

不必举例1929年世界经济恐慌的发生、1932年满洲事变的爆发，以及1933年纳粹政权的成立等现代史年表上的事实，也会得知1930年意味着世界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历史发端。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本虽说在关于极东的德国权益方面以外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更多注目，但参与世界大战本身意味着日本积极地参加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史”中来，不久便开始要求“世界秩序”的重组了。在参战的同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21条要求（1915），它既是日本为把满洲划归于自己的权益范围予以统治而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东亚国际秩序提出帝国主义式重组的要求。通过这场战争日本确实逐渐成了“国际政治游戏中的主要

制衡力量”^[14]之一。

在昭和时期的日本为确保其在东亚的权益范围，向世界要求“世界秩序”重组的主张中，通过重新认识“世界史”而给出明确的哲学性表述的，是所谓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或者“世界史的立场”。结集于西田几多郎影响之下的京都学派年轻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推进了有关“世界史”再认识和“世界秩序”重组的哲学性话语化。他们是把“世界史”作为“近代”这一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欧洲世界史的阶段”来把握的，并再次对近代日本遇到的“世界史”正是“欧洲世界史”这一状况做了确认。让我们通过“世界史的哲学”之代表性论客高山岩男的理论来追溯一下“欧洲世界史的阶段”之成立过程吧^[15]。

“欧洲世界史”的成立是欧洲膨胀扩张的结果。成立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其发展必然要以欧洲以外的地区为市场，要求这些地区成为资源的供应地，而引起欧洲世界的扩张。于是，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若没有欧洲以外地区的存在，欧洲本身也就无法存在了。这便是“欧洲世界史”的阶段。从文化史上观之，这也是通过近代欧洲文化的传播“非欧洲地域之欧洲文明化”阶段。这样，因非西洋者包含在欧洲近代文明中，故形成了“世界文化”或者“统一的文化世界”。“近代”是世界统一于这个“欧洲中心的世界”之时代。“欧洲近代”这一历史性阶段也就作为“欧洲世界史”而得以成立起来。

高山进一步强调，作为欧洲文化之普世性扩张的“近代”还伴随着欧洲式近代国家原理的普世性扩张。“不久，非欧洲地域的国家也具备了欧洲式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果成了与欧洲的国家对等的近代性国家。”因此，“世界史”的成立亦是欧洲近代国家原理向世界扩张的时代之开始。与“世界史”同时成立的“世界秩序”也必然内在地包含了国家间的对立。进而，高山在这种内涵国家间对立的秩序中，看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性世界不能不崩溃解体的原因。

战争与“世界史的哲学”

“世界史的哲学”其立场中对于“欧洲世界史”成立的理解和认识，与我们作为讨论“世界史”之前提的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和“世界史”成立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沃勒斯坦的普遍主义式体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也是内涵着国家间的体系上之矛盾的。的确，只要“世界史的哲学”之立场是一种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局看到了“欧洲近代原理彻底破产”的历史认识，那么，这一认识将与后现代（现代以后）的世界认识没有什么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今我们有必要对成立于1940年日本的“世界史的哲学”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解读。例如，他们针对一元论“欧洲世界史”的支配曾提示出与之对抗的多元论世界。

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世界中，必须承认多种世界史，多种历史性世界的存在。总之，坚持历史性世界的多元化立场，乃是考察真实的世界史所不可或缺的条件。^[16]

对于“世界史”的再认识和追求其重组的要求，也是对“近代”进行批判性超越的要求。“世界史的哲学”最初便披上了超越“欧洲近代”这一世界观的外套。但是，这个“世界史的哲学”从自身立场出发所形成的世界认识和近代批判的话语却成了实施“大东亚战争”的帝国日本之立场的哲学化粉饰，也只能成为这样一种东西。我们观高坂正显、高山岩男等京都学派年轻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关于战时话语的代表性记录《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17]，发现他们似乎通过多次座谈会相互之间印证了这一点。这个鼓动狡辩饶舌、西田遗传的历史哲学式文词的哲学性话语最终印证了下面这一事实，即因其哲学叙述的风格使之只能成为隐蔽的欺骗性叙事。然而，为何“世界史的哲学”话语只能成为帝国日